

译者惯习视角下莫言小说语言变异的英译研究

——以《酒国》和《蛙》为例

余月月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从译者惯习角度,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酒国》和《蛙》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及其翻译策略:通过对词汇变异、语义变异、语法变异三方面进行考察,得出葛浩文翻译《酒国》中语言变异时,采取直译和意译相协调的策略,而翻译《蛙》中语言变异时,更倾向于直译;描述葛浩文在翻译两部作品期间的译者惯习变化,进而分析“译者惯习”“翻译场域”“译者资本”对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蛙》比《酒国》更倾向于直译可归因于葛浩文日渐形塑的译者惯习、态势良好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场域以及不断积累的译者资本。

关键词:语言变异;翻译策略;译者惯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3-0059-06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优秀、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他追求语言个性,善于通过语言的变异,细致地描绘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活动,帮助读者深入、透彻地解读文本。他小说中的语言变异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莫言从本土作家蜕变为世界级作家,除了要归功于其作品本身的文学特质,首席翻译家葛浩文及其团队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亦为其成功创造了必要条件。近十年来,尤其是莫言获诺奖之后,葛浩文如何解读和翻译莫言小说中的语言变异,逐渐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内容。

一、译者惯习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概述

译者惯习(translatorial habitus)属于翻译社会学范畴,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布迪厄认为惯习是“构成体系的定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反映的是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⁴⁷惯习具有“被结构化”和“结构化”两个特征,“在实践中获得,持续不断地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之中。”^[2]布迪厄进一步提出,译者惯

习是客观社会结构与译者行为的中介,是社会规范系统在译者身上的体现。^[3]这一主客结合的概念使翻译研究向前迈了一步,阐明了个体主观因素与社会客观因素共生共存,同时也表明译者惯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不断形塑过程中。

从译者惯习角度观察译本面貌和译者行为是当前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有关译者惯习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但近五年的研究热度上升较快。目前译者惯习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主要有以下内容:首先,探讨译者的翻译选材。译者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原语文化语境和译语文化语境都会对译者的惯习系统产生形塑作用,而译者惯习会决定译者的翻译选材。^[4]其次,聚焦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策略是译者惯习的重要外显形态,也是国内学者研究较多的内容。此类研究或选取单个译本,分析译者所选取的翻译策略;或将某部作品的不同译本作对比分析,继而探讨译者惯习。^[5]再次,探析作品的译介。此类研究所占比重较大,借着布迪厄社会学视角,将场域、惯习及翻译活动结合起来,分析译作的接收和传播情况。^[6]最后,研究译者惯习的形成轨迹。目前在

收稿日期:2021-04-21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20A0592)。

作者简介:余月月(1988—),女,安徽合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知网中仅有不到 10 篇文章探讨译者的历时翻译活动,其中包括对鲁迅、胡适、杨宪益、朱生豪等著名翻译家的惯习描写,分析他们翻译观的历时演变,以及对其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综上,国内学者对译者惯习的研究多基于翻译个案,历时研究相对缺乏。

二、《酒国》和《蛙》语言变异英译对比研究

1. 莫言小说中的语言变异

英国著名文体学家利奇曾说:创造性地运用语言,体现在作者能用超越常规的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语言表达方式,^{[7]13}这种“超越常规的表达方式”即语言变异。语言变异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突出的语用效果,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的恰当运用,能更有效地刻画人物形象以及传达作者的写作意图。

语言变异现象存在于莫言的多部作品中,语言变异“使有限的语言所传递的语义信息和审美信息增值”,形成了莫言绚丽多彩的文学语言形态。^[8]目前国内对莫言小说中语言变异的翻译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以单部作品为研究文本,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小说中的语言变异(如色彩词、方言、或拟声词)及其翻译策略。^[9-10](2)针对不同小说中语言变异及其翻译的历时研究屈指可数,并且也聚焦某个语言现象的翻译(如方言、或意象等)。(3)研究多倾向于选取传统的理论视角,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法基本一致,而从译者惯习角度分析语言变异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历时研究。此外,研究对象不均衡,部分作品如《红高粱家族》及其英译本的研究者扎堆,而其他作品受关注度不够,同时仍有较多研究集中在文字翻译的层面,而影响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多方面原因,如中国当代小说翻译场域及译者资本等,还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

基于小说的语言特点,并结合译者翻译生涯的分期方法,^{[11]18}笔者选取的研究对象为莫言的两部小说及其译作,即《酒国》(*The Republic of Wine*, 2000)和《蛙》(*Frog*, 2014)。这两部小说的英译本分别为译者葛浩文翻译生涯早中期(1999—2012)和晚后期(2013 至今)的作品,且都由西方商业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相隔十四年。选取这两部作品进行历时对比分析,可以得出译者惯习在此期间发生的转向,进而探究翻译场域

及译者符号资本对翻译策略所产生的影响。

2. 语言变异英译的对比分析

根据利奇提出的八种语言变异形式,^{[7]19}笔者梳理了《酒国》和《蛙》中的语言变异现象,归纳出两部小说中最常见的三种变异形式:词汇变异、语义变异和语法变异,且这三种语言变异形式在两部小说中的总数量及分布相差不多。基于对三种语言变异例子的分析与统计,发现译者主要采取了三种翻译方法,即直译保留变异、意译舍弃变异、省略不译。两部作品中语言变异的处理情况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葛译《酒国》中语言变异的处理情况

语言变异形式	直译保留变异	意译舍弃变异	省略不译	总计
词汇变异	1	16	1	18
语义变异	5	14	1	20
语法变异	10	9	2	21
总计	16	39	4	59

表 2 葛译《蛙》中语言变异的处理情况

语言变异形式	直译保留变异	意译舍弃变异	省略不译	总计
词汇变异	1	6	0	7
语义变异	16	9	1	26
语法变异	17	5	1	23
总计	34	20	2	56

葛浩文致力于将原文的内容与风格再现于译文中。^[12]三种语言变异的翻译中,直接将原文语句省略不译的例子极少,说明译者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原文。通过比较数据可以看出,《蛙》中语言变异的翻译较多地采用了直译保留变异的方法,而在翻译《酒国》中的语言变异时,大部分情况下译者都将语言进行处理,意译舍弃变异,译文常规。以下从词汇变异、语义变异和语法变异三个方面,对《酒国》和《蛙》中语言变异的翻译作对比分析。

(1) 词汇变异

莫言在词汇方面有很多创新,有些是更换语素,如《酒国》中的“人仗狗势”“一触即跑”“昏昏欲醉”“美吃如云”“驴事如烟”“彻里彻外”“不上猿山,何觅猿酒?”,《蛙》中“先兵后礼”“心黑手毒”“孽上加孽”;有些是拆分或重组词语,如《酒国》中“大人不见小人的怪,宰相肚里跑轮船”“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只管说”,《蛙》中“革掉

旧法接生的命”“既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以小不人道换取大人道”等。这些语言变异的例子要么是对中国成语的换字重写,要么是对俗语诗句的改写变异,翻译难度不小。因此,葛浩文在翻译两部小说中词汇变异时,大多数采取了意译舍弃变异的方法,变换语言变异形式使得译文常规。

例如,在《酒国》里,葛浩文将“人仗狗势”译为“hiding behind that dog of yours”,将“黄色令人昏昏欲醉”译成“a numbing color, an intoxicating color”,均没有传达出原文中语言变异;另在《蛙》中,将“革掉旧法接生的命”和“既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分别译成“do away with old birthing methods”和“born in the wrong time and place”,原文分别是对词语“革命”和“生不逢时”的变异,这些词汇变异并没有在译文中体现出来。词汇变异的英译的难度在于,首先很难找到与“生不逢时”“先礼后兵”这些词语对等的英语词汇,而莫言将这些成语进行变异,又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此,葛浩文选择了保留原文的内容,舍弃了形式,这样能够传达原文的意义,但译文读者就无法体验源语读者在阅读此类语句时的新奇感受。

(2) 语义变异

语义变异是指某些成语或者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新的意义,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葛浩文在翻译两部小说的语义变异时,《酒国》中较多地采用了译文常规的手法,《蛙》中也有部分例子译文常规,但直译保留变异的例子比译文常规的多。

①您还是品酒的大内高手。^{[13]85}

葛译:... but you know your way around a liquor bottle. ^{[14]93}

②奶奶对我娘说:你是轻车熟路了,自个儿慢慢生吧。^{[15]21}

葛译:My grandmother said to her, you don't need any help. Just take your time. ^{[16]24}

先看这两个例子,词语“大内高手”“轻车熟路”分别被作者赋予了新的意义,前者指非常善于品酒的人,后者指有生孩子的经验。在翻译这两个词时,译者都使用了意译的方法,将原文的意义传达了出来,而舍弃了原文的形式。

③她是盐碱地,我只播种,但她不发芽!^{[15]263}

葛译:She's barren. I can do the planting, but there'll be no sprouts. ^{[16]289}

④你……自己也去查查,没准你的种子是炒

过的!^{[15]263}

葛译:Go get checked. Maybe your seeds have all been fried. ^{[16]289}

⑤红色木头把她的傻瓜侄子介绍给我,这也是根红色木头。^{[15]43}

葛译:Red Blockhead introduced her dumb nephew to me, another Red Blockhead. ^{[16]49}

以上是《蛙》中的几个语义变异的例子。这三个句子中的语义变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选择将这些词语和表达直译出来,并未给出相应的解释。译文读者读到这些英文表达时,会有较强的陌生感,但葛浩文并未选择意译或加注释的方法,这些陌生化的表达一方面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和风格,另一方面给译入语注入了新鲜的内容,丰富了译入语的表达方式。

3. 语法变异

词类活用、违反规范的句子语序等语言变异形式即语法变异。语法变异带来的未必是语义上的明显变化,却给源语读者语言上的新鲜感和独特感。《酒国》中语义变异的翻译较多地采用了译文常规的手法,《蛙》中也有部分例子译文常规,但更多见的处理方法是直译保留变异。

⑥所有的过渡性语言都被抛弃,好像有些夹生,但她吞下去夹生,……^{[13]4}

葛译:Now that he'd dispensed with conventional small talk, the question hung out there like half-cooked food. But she forced it down her gullet. . . ^{[14]5}

⑦那碧绿是一种超级的碧绿,碧绿出了蓬勃的生命力。^{[13]67}

葛译:The green was such a transcending green it exuded a powerful life force. ^{[14]72}

⑧他象征着狂欢,……,象征着自由精神的飞扬跋扈。^{[13]276}

葛译:He represented wild ecstasy, . . . , the releasing of a soaring free spirit. ^{[1]285}

以上三个例子均出自《酒国》,译文都没有传达出原文中语法变异。例⑥中第二个“夹生”是形容词变异名词,译文后半段中用“it”指代前面的“half-cooked food”,句型及词汇的使用属常规。例⑦中第二个“碧绿”形容词变异动词,译文中的两个“green”都是名词,属于该单词的常规使用,句子表达中规中矩。例⑧中“飞扬跋扈”为词语色彩变异,贬词褒用,译文的整体句型与原文保持

一致,但“the releasing of a soaring free spirit”没有传达出原文中的语言变异,译文常规。

⑨但你姑姑太革命太正派了……^{[15]43}

葛译:But your aunt was too revolutionary, too principled. . . ^{[16]47}

⑩这……是文化的淤泥历史的淤泥。^{[15]184}

葛译: . . . silt that is. . . , cultural silt, historical silt. ^{[16]197}

例⑨《蛙》中描述主人公“姑姑”的句子。句中“革命”也属于词性的活用。“革命”本是名词或动词,在此处用作形容词,前面用“太”修饰,表示一种程度。“太革命”的意思是姑姑非常忠于党的革命精神,甘愿为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这一词性活用增强了环境背景的政治色彩,更鲜明地刻画出姑姑的人物形象。“太革命”与“太正派”构成平行,造成了前景化的效果。译文中“revolutionary”原常放在名词前作修饰性形容词,即作定语,但译者将其用作表语性形容词,前面加“too”表示程度,“too revolutionary”这样的表达在英文也是超常规的,因此,译文将原文中的语法变异传达了出来,效果甚好。例⑩描述的是“秦大师”捏泥娃娃用的泥土,是“胶河河底”挖出来的,作者形容泥土古老,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将其说成“三千年沉淀下来的淤泥”,进而修饰为“文化的淤泥历史的淤泥”,这两个偏正短语属于语法变异,因其修饰语和中心语的超常规搭配。葛浩文将其直译为“cultural silt, historical silt”,这两个短语在英语中也属于语法搭配变异,非常规的用法营造了陌生化的效果。

三、译者惯习、翻译场域、译者资本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有三个基本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是指“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17]56}但翻译场域是一个相对不独立的场域,与其他相关场域相互影响,如权力场域等。^{[17]10}布迪厄提出资本有三种基本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由经济、文化、社会资本转化而成,场域里的参与者倡导的某种新的资本结构获得其他参与者认可后,这种资本形式就成了“象征资本”。原作者和译者均拥有一定的象征资本,有些是原作者给译者增加了象征资本,有些是译者为原作者创造了象征资本,具体情况如何,则需要根据个案来做分

析。^{[17]10}以下将从译者惯习、翻译场域、译者资本三个方面出发,分析葛浩文在翻译《酒国》和《蛙》中语言变异时所采取策略有所差异的原因。

1. 译者惯习

译者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实践活动对其产生了影响,使其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思想认识,构成了译者惯习,而译者惯习又会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外显出来,主要表现为翻译策略的选择。葛浩文的译者惯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定的演变轨迹。较早期在翻译《红高粱家族》等作品时,考虑到市场因素,葛浩文总体上的翻译策略是以归化为主,在翻译时经常会对原作进行删改,以增强译作的可读性,让国外读者更容易接受。而在翻译《酒国》时,葛浩文已翻译并出版了二十多部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作在国内外广受关注和好评。此时,被誉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译者惯习也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的“商业翻译模式”转变为“适度回归学术翻译模式”。^{[11]21}从文本分析中可以看出,《酒国》的翻译策略是归化和异化相融合,整体上倾向于异化、直译,该译作相比较之前的《红》等的译作而言,更忠实于原作,虽偶有误译或翻译流失,但整体的翻译质量相对信实可靠。虽然我们称之为“回归学术翻译”,但实际上翻译风格的转变是葛浩文的一种尝试,是对市场的一种试探,由于译介与传播模式等原因,该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不如1993年出版的《红》英译本。

在葛译莫言长篇小说中,《蛙》是较新的作品,与《酒国》译作出版时间间隔十四年。在此期间,葛浩文自身的写作能力和翻译能力得到提炼,因此,其“成熟的学者惯习”在作品中凸显出来。葛译《蛙》中灵动传神的译笔更为多见,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得出,在翻译《蛙》时葛浩文更多地倾向于直译。葛译《蛙》在英美市场反响良好,《纽约时报》等对该书及葛浩文的翻译评价颇高。由此可见,《蛙》的翻译与传播相比较《酒国》而言较为成功。

2. 翻译场域

翻译场域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学场域等相互联系,同样制约并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酒国》的英译本出版于2000年,彼时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虽呈上升的趋势,但中国文学翻译场域尚待发展。弱势文化国家中的文学作品想要打入强势文化国家中,译者的翻译策略

和译介的传播模式都相当重要。除了之前颇受关注的《红》及其英译本,成功推介到英语世界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屈指可数。《酒国》在出版之初国内读者对其关注不多,但葛浩文认为《酒国》是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和最为丰富的作品,小说在英美出版后,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影响力远不如《红》的英译本。并且,国内读者对《酒国》的英译本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同样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场域的形势尚未明朗。

2014年《蛙》英译本出版之时,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中国文学的知名度随之提高,西方读者对中国及中国文学的兴趣增强。尤其是2012年莫言凭借《红》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的及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文学翻译场域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中国文学地位的提升,也给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增添了信心,以葛浩文为首的翻译团队更注重将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国外读者,这也是《蛙》中语言变异的直译方法采取较多的原因之一。

3. 译者资本

翻译场域中译者的象征资本主要包括“良好的双语功底、对相关领域的熟悉程度、对翻译理论的把握以及过往的翻译经验”^[17]¹⁰等。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会对自己拥有的各种资本进行合理地评估和调用,这也会呈现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2000年,葛浩文已经被誉为首席翻译家,他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所付出的努力,让他在英美及国内的名气有所提升,尤其是根据《红》翻拍的电影在国际上走红之后,国内读者开始更加关

注《红》的译者。此时的葛浩文积累了一定的读者基础,但影响力还远不如十二年之后。2012年莫言获诺奖,大大提升了莫言的象征资本,而作为莫言作品的“御用”翻译者,葛浩文的译者资本也相应得到大幅提升。拥有了丰厚的译者资本的葛浩文及其团队,在翻译作品时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国外出版社也给了他们更大的空间,因此,《蛙》的译作直译保留了原作中的大部分语言变异,这是葛浩文译者资本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葛浩文认为“更新与增添从汉语而来的外来语的时机已到”,^[18]译文读者在阅读《蛙》的英译本时,对译文中语言变异会产生陌生感,而这正是译者想要传达的异域风情。

四、结语

莫言作品中的语言变异形成了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本文选取莫言两部作品《酒国》和《蛙》及其葛译本,探讨葛浩文在翻译小说中语言变异时所采取的策略,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葛浩文在翻译《蛙》中语言变异时,更倾向于使用直译;再从译者惯习、翻译场域和译者资本三个方面分析译者翻译策略的差异。葛浩文译者惯习的演变、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场域的发展态势和译者资本的积累都会对译者翻译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国文学地位日趋提升,作者及译者象征资本日渐丰厚,以及译者惯习的不断形塑,译者更愿意让译作最大程度地贴近原作,使得国外读者能够欣赏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也有利于中国文化真正地走出去。

参考文献:

- [1] BOURDIEU PIERRE. Sociology in Ques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3.
- [2] 布迪厄,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3] BOURDIEU PIERRE. Habitus[C]//HILLIER, JEAN, EMMA ROOKSBY. Habitus: A Sense of Place.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43-52.
- [4] 徐敏慧. 从翻译规范到译者惯习: 描写翻译研究的新发展[J]. 中国翻译, 2017(6): 11-17.
- [5] 冯全功. 葛浩文翻译策略的历时演变研究——基于莫言小说中意象话语的英译分析[J]. 外国语, 2017(6): 69-76.
- [6] 段文颇,魏萌桦. “惯习”“资本”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以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为例[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83-89.
- [7] GEOFFREY N. LEECH G N. A Linguistic Guide to English Poetry[M]. Britain: Longman, 1969.
- [8] 姬凤霞. 莫言小说语言变异审美[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48-51.
- [9] 吴丹. 莫言小说《蛙》的修辞研究[D].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15.
- [10] 叶艳. 莫言小说修辞英译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 [11] 汪玉荣. 葛浩文译者惯习历时变化考察——以《红高粱家族》《酒国》为中心[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 17-25.
- [12] 莫言. 蛙[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13] 莫言. 酒国[M]. 中国台北: 洪范书店, 1992.
- [14] HOWARD GOLDBLATT. The Republic of Wine[M].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2000.
- [15] 曹顺庆, 王苗苗. 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124-128.
- [16] HOWARD GOLDBLATT. Frog[M]. Melbourne: Penguin Group, 2014.
- [17] 王悦晨.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现象: 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键词解读[J]. 中国翻译, 2011(2): 5-13.
- [18] 邢杰, 陈俊娜. 场域理论视阈下葛译《蛙》翻译策略探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2): 59-67.

On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Deviation in Mo Yan'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s Habitu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epublic of Wine* and *Frog*

SHE Yueyu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orial habitus,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devi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Wine* and *Frog*.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lexical deviation, semantic deviation and grammatical deviation, and shows that Howard Goldblatt adopted more direct translation methods in *Frog* than in *The Republic of Wine*.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gradually mature translatorial habitus, the increasing translator's capital and the promising translation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language devi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translatorial habitus

(责任编辑: 沈建新)